

中国走出去战略 研究报告

主编 肖勤福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反走私战略

研究报告

王明 肖蔚华



中国海关出版社

中国“走出去”战略 研究报告

主 编 肖勤福

副主编 刘德喜 史妍媚 贾俐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走出去”战略研究报告/肖勤福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10
ISBN 7-5035-3031-6

I. 中… II. 肖… III. 对外投资—经济发展战略
—研究报告—中国 IV. F83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792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装订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A5 印张: 13.375

字数: 328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序 言

一、我国对外开放的新背景、新机遇、新挑战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持久的辉煌，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都曾把中华文明的光彩撒播到世界许多角落，在马可·波罗的眼里，东方的中央帝国应当是世人向往的地方。但所有这些，都属于自然经济年代——一个并未把国际经济交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必需条件的特定历史阶段。等到对外开放作为客观规律支配经济发展，进而将原本独立甚至孤立的国别经济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世界经济降临时，中国却落伍了。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近代以来中国衰落的原因，提出许多见仁见智的看法，但有一点无论如何是确定无疑的：中国之所以没有及时搭上工业革命的时代列车，是因为没有对外开放这一张“车票”。

在近代史上，由于不开放，中华民族曾经错失了太多的历史机遇：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带来近代工业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机遇时，中国的当政者正陶醉在所谓的“康乾盛世”里，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最要紧最要命的，就是闭关锁国。一纸禁海令所隔绝的，绝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与海外民族的经济贸易往来，而是中华民族与世界文明演进的

主潮流。中华民族从此落后于世界，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导致 19 世纪下半期、20 世纪初第二次历史机遇时，中华民族终于有人睁眼看世界，先是试图通过“洋务运动”以科技和实业强国，后来又试图通过“戊戌变法”以“变法图新”，但在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它们终归都失败了。而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个邻居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了富国强兵。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结果就出现了甲午海战、马关条约以及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以及中华民族八年的浴血抗战。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不开放就不能抓住历史机遇，不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就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所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再也不能错失机遇，中华民族已经错失不起。“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这是立足于活生生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有沉甸甸的历史分量。要抓住机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对此，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历史的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要求的、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①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08 页。

20 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面临的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是什么呢？

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首先是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展开。目前，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环境技术、纳米技术等为骨干技术群的新技术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有的新技术如信息技术已经高度产业化，有的新技术如生物工程技术正在产业化，有的新技术如新材料技术将要产业化，还有的新技术如纳米技术也已经展现了宽广的产业化前景，它们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次新技术革命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历史上前 3 次技术革命分别以蒸汽、电力和核能的动力变革为标志，主要是通过人的肢体或体力的延伸，极大地提高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这次技术革命则以信息化为标志，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头脑或智力的延伸，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提高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如果说前 3 次技术革命分别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那么这一次技术革命则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的智能化，促成了人们日益关注的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之间的科技竞争空前加剧，科技竞争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最终决定因素的新局面已经形成。其次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贸易、金融、生产和科技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借助以世界各国市场化改

革为契机而实现的全球市场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度深入展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直接流动和配置。它突破了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资源基本在国内流动和配置的传统模式，极大地拓展了资源流动和配置的空间，强化了资源的流动性，创造了资源更为合理配置和利用的新机会，开创了新技术革命基础上全球资源流动和配置的新时代。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全球流动和配置的实现机制是：（1）国际分工的发展。传统的国际分工是产业层次上的分工，典型形式就是诸如“工业欧美—农业亚非拉”之类的垂直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部门和行业层次上的所谓水平分工，有关国家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重点发展一些部门和行业的生产来参与国际交换；现在的国际分工，已经深入到产品和企业层次上，形成了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它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分工。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在境外组建各种各样的分支机构，来负担不同环节的生产任务，把分布在不同国家的生产分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其显著特征是产品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产品零部件之间的分工，改变了过去国际分工那种“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格局。零部件来源的多国化，是当今企业的普遍做法。新的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总的说来是经济合理化；其直接目的，是贴近消费者，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资源或企业稀缺的资源，达到经济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它借助全球市场化等条件，总是力图超越它所遇到的任何国界，哪里有利

就发展到哪里。(2)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自 1982 年世界债务危机以来, 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明星”形式, 50 年代其年均增长率为 4.3%, 60 年代为 5.3%, 70 年代因严重的世界经济不景气而出现了下降, 只有 1% 强, 但在 1983—1997 年间竟达到了 16.7%。如果从 1973 年算起, 到 1995 年, 国际直接投资总共增长了 11 倍, 而同期内国际贸易尽管也在持续增长, 但只增加了 7 倍。国际直接投资的年流出量, 1981 年为 486 亿美元, 2000 年为 12800 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正取代国际贸易, 推动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生产经营模式, 向海外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乃至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新的生产经营模式转换, 从而实现产品跨国流动向产品跨国流动与资源跨国流动相结合的方向转变。(3) 跨国公司的发展。根据 2003 年 9 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 2002 年全球拥有 6.4 万家非金融跨国公司, 其境外分支机构总计 87 万多家。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 它们掌握着世界直接投资的 90%, 世界总产值的 1/3 和发达国家总产值的 50%, 控制着国际贸易的 70%, 拥有世界上 80% 以上的新技术、新工艺的专利, 控制着 70% 以上的国际技术转让。20 世纪末, 全球最大的 100 支经济力量中, 有 49 个国家和 51 个跨国公司。许多跨国公司“富可敌国”, 世界经济正日益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跨国公司的一系列活动, 都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瘦身”运动即围绕巩固核心业务展开

的业务重组，其“强体”运动即旨在提高新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兼并，尤其是大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推动了世界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和与此相对应的“隐形公司”等等，也都改变了市场的竞争态势和生产的组织过程。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模式，与企业传统的国内生产、国际销售模式相比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企业已经不再受国界的局限，真正能够面向全球消费者，捕捉全球市场机会，利用全球资源，获得全球发展空间。这种变化，也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深远的变化，它改变了世界经济传统的国别生产、国际交换的发展形式，在生产全球化的基础上大大强化了统一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作用，从而增强了世界经济的统一性。

从国内经济的角度看，首先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党中央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加快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实质上，它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比以前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对外开放，可以说它将我国对外开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后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这个新的实际出发，始终要有世界眼光和外向的战略思维。世贸组织规则总体上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它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国际统一规则完善市场运行机制，在宏观层面上加快转变

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手段体系，加强政府服务；在微观层面上深化企业改革，促进真正适应规范的市场经济运作要求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成熟和完善，使企业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在此基础上，要求我们掌握在国际国内一体化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本领，切实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进入新世纪，我国经济在经过 20 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量变导致质变，在人均 GDP1000 美元的基础上，出现了向新的更高阶段转变的内在要求。在此关头，我们面临着两种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考验。一种前途是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突破资源、环境、市场、效益、竞争力等等的多重制约，充分利用积累能力增强、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技术研发能力提高等有利条件，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另一种前途则是沿用传统发展观和发展方式，继续激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经济运行紊乱、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为继，为“发展陷阱”所困。我们必须经受住考验，在前一条道路继续高歌猛进。再次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展到今天，比较容易解决的那些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现在面对的都是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最后成功。而且应当看到，在经济全球

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因素的影响愈来愈大。最后是对对外开放进入阶段转换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已渡过了初步发展的阶段，正在走向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新阶段。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将由目前的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国别政策推进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国际体制保障的相互开放。我国面临着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扩大出口等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国际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20多年来经济实力和经验的不断积累，为我国对外开放实现这种阶段转换创造了条件，但在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欠缺，又对转换形成了明显的制约，需要我们着力去解决。

二、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任务、新部署、新举措

在上述背景条件下，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大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新要求。这一要求的核心内容是：着眼于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我国经济的各种优势，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更加积极地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着眼于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实现，更好地为国有企业的“三改一加强”服务，更努力地同市场经济的国际规则接轨，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着眼于增强对外开放的实效，针对新的要求和存在的问题，采取扎实措施，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目标是，“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①

这一新的要求和目标，以我国对外开放的两个重大战略举措为基础，其一，我国在2001年12月终于加入了世贸组织；其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于2000年作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大决策。加入世贸组织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不仅本身就是走向世界的更加积极的姿态，而且为我们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提供了途径、方法和制度保障。在新世纪的对外开放目标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我国对外开放从旨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到同时致力于“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要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在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全球资源流动和配置过程中获得我们的应有权益，通过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国际国内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内，优化我们所能获取的更多资源的配置，把握和利用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我国新世纪的对外开放，旨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和两类发展机会。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转型和新发展。

要能够在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的历史背景下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我们必须立足新的时代实际，在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进创新。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推进理论创新

1. 必须明确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经济全球化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进程。它对我们来说决不是一个要不要和能不能避免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适应和利用的问题。而且，目前经济全球化仅处在其初步发展的阶段，今后将会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加速发展，形成更大的影响。例如就物质技术条件而言，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发展，将进一步提供诸如国际互联网、卫星通信、高效运输之类更为成熟的物质技术条件，从而更加便利资源的跨国流动和配置，进一步加强跨国联系和协调的及时性，继续降低跨国公司全球运营的成本。例如，1930—1990年，空运的成本已经从每英里68美分降低到11美分，纽约与伦敦3分钟的通话费也已经从244美元减少到3美元，预计到2010

年将进一步减少到3美分。经济全球化将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获得新的更大发展。在此情势下，经济全球化决不会因为其负效应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存在而逆转。我们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只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才能加速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任何盲目抵制和反对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我们的注意力，始终应该集中在怎样趋利避害上。

2. 必须正确看待民族经济的保护和发展问题。经济全球化对民族经济的传统认识和保护办法，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造成人们认识上的分歧。这在我国围绕关于利用外资作用的评价上，也有明显的反映。我国在1995—1996年达到高潮的一场大争论，围绕着到底是“我们利用了外资”还是“外资利用了我们”展开，表面上看是对近20年来我国利用外资作用截然不同的评价，实际上却反映了对经济全球化意见的分歧，其焦点在于如何理解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的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态度。我国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实践雄辩地说明，利用外资、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至于在此过程中“谁利用了谁”的问题，总的说，应该是互利的，如果不能获利，我们就不会同外资、跨国公司打交道，同样，外资、跨国公司也不会跟我们打交道。问题仅仅在于利弊的平衡，或者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利益尽可能大些，弊害尽可能小些。这就需要对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如股权结构、品牌使用、技术转让、

市场开放等作具体的分析，把问题归结为政策与做法的检讨和完善更为准确一些。

关于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的认识，第一要看到，只要存在着民族国家，历来就有一个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客观存在的问题，即便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当代世界中，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主权彼此还是有明确边界的。情况有所改变的，仅仅是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的具体界定和它们的发展形式，不能因此说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的概念过时了。第二要明确，只要客观存在着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就有一个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加以保护和发展的问題，因此就不能否定我国利用外资、参加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必要重视和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开放条件下民族经济的保护，不能再沿用过去的路子和手段，总的说来，不能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力量的保护和对外资的限制，单纯的行政保护已难以为继，想限制也限制不住；要靠改革、竞争和自身的加速发展，包括通过企业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自己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壮大等等，同时争取利用可能的保护措施。第三要清楚，对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的适当保护，要以总体上顺应而非实际抵制经济全球化发展为前提，其限度是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通行的做法，不能超越国际通行做法自行其是。而且，对于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的适当保护，也不能理解为对每一个具体部门和行业的保护，要求股权和市场必须占到多少比例以

上，而是对民族经济总体的保护。这种保护关键是对民族经济发展权益的保护，也就是经济主权和产业安全的保护，而不是对发展程度和发展水平的保证。此外，保护的目地，也不是使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免受外资和外国产品的竞争，而是使竞争合理化。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不允许把所谓的保护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同经济全球化隔绝开来，发展壮大民族经济的要求也不允许这样做。保护是发展的手段，不应成为发展的桎梏。依据以上认识，我国对外开放不存在什么限度的问题，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继续大力利用外资，这样才能最终保护和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否则我国经济发展总是落在别国之后，那才是真正削弱和损害我国民族经济和民族工业。

3. 必须正确理解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问题。不少人担心经济全球化会削弱国家的经济主权，损害国家的经济安全。这种担心应该说有一定的理由。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由于力量弱小，在强大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压迫下，可能会出现被边缘化从而经济主权和安全受损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实践中，这仍然是一个尽可能趋利避害的问题。在思想认识上，应该看到这种担心往往伴随着对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不正确的理解。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避免参与，或者不开放，就能消除危险，这是完全行不通的。不参与、不开放，闭关自守，结果只能是远远落后